

◀ （上接 8 版）

致的。因为我们想强调“男子气概”与“女性气质”一样，都是社会构建出来的，这是虚伪的，也是有害的。如果我们仅仅将女性作为研究的主题，那么女性特征自然就成为“问题”。我们必须克服这一点。

就美国妇女史而言，我们也经历了上述思想观念的转变。第一代妇女史研究者尝试模仿男性的历史，研究伟大的女性人物，提出“历史中也有女性”。我们谈论苏珊·B.安东尼(Susan B. Anthony)、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和哈丽雅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等不同身份的女性，把她们置于历史图景之中考察。第二代学者转而关注妇女的生活：女性做什么？她们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第三代研究者提出了新问题，例如，女性通常负责纺织和制陶，纺织在世界历史中起到什么重要作用？陶器在技术史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探究女性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而非仅仅说：“嘿，看，这儿有女性。”

到了我这一代，我们反对研究“女性”这一概念，转而研究“性别”。在我的课堂上，我引导学生们理解性别体系的运作，每个社会都靠它来界定“女性”、“男性”、“男子气概”和“女性气质”。性别体系的各个方面相互依赖。这是一种流动的体系。任何女性气质的变化，相应都会引起男子气概的转变，反之亦然。这是当下这一领域的知识前沿。

您是否认为，在女权主义者和其他群体的推动下，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发生了转变？

莎伦·安·霍尔特：我认为存在改变的可能性。但是，作为一名研究女性与女性历史的学者，我感到挫败的是，长久以来性别研究几乎没什么新进展。多年前，我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性别研究导论”，基于史诗和文化伦理学设计课程，尽可能囊括我所了解的所有女性。我们谈论罗马、圣经、非洲领袖和中国四大美女等，所有的故事千篇一律。全世界的女性都只有三个结局：或小心行事，一事无成；或取得成功，被世人遗忘；或取得成功，遭人诋毁。我对此感到绝望。这个世界会发生改变吗？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否需要改变？回答是肯定的。

时常遭遇传统的性别问题，已成为我以学者身份成长的一部分

您曾提到嫁给像迈克尔·朱克曼这样杰出的历史学家是一把双刃剑，在是否给您提供奖学金的问题上，人们犹豫不决，因为他们觉得身为著名历史学家的夫人您不会缺钱。然而奖学金也是一种学术荣誉。您能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经历吗？作为一名女性学者，在您职业生涯中有哪些值得一提的经历呢？

莎伦·安·霍尔特：这是我们共同经历的趣事。我不想被迈克的光彩所掩盖，所以放弃了很多研究美国早期史的机会，选择研究美国历史的其他领域。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姓“朱克曼”，这不是我们那一代女性主义者的做法。因为假如冠以“朱克曼”，在学术上我永远都不可能以“霍尔特”而取得独立地位。有趣的是，迈克的母亲和我的祖父从未理解我的决定。在我们刚结婚那几年，我还在读书，当把我们介绍给其他人的时候，她会说：“这是我的儿子迈克尔·朱克曼博士，以及他的太太莎伦·朱克曼。”在我取得学位后，她改为：“这是我的儿子迈克尔·朱克曼博士，以及我的儿媳莎伦·霍尔特博士。”我既是独立的学者，同时也是迈克的妻子。有意思的是，我想迈克从未思考过把他的姓改成“霍尔特”。人们从来不要求男人改姓，但总是对女人提出要求，强迫她们做出一连串的决定。我的两个女儿都跟随她们爸爸姓，这一点我能接受，因为她们需要一个姓。我经常在课堂上谈论我的名字，因为它是一个问题。

在这些对我的教学产生影响的事情中，名字只是其中一件。“教授”是一个由男性定义并授予男性的职位，作为一名女性，应该如何获得教授职位呢？我有很多选择。其一是接纳那种老套的性别角色视角，让人们用权威的眼光和语气审视你的女性气质，而女性则以被立牌坊为目标，卑躬屈膝地作出迎合，这令人不悦。我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展现自己作为一个完整女性的全部。在课堂上，我十分坦率，对学生敞开心扉，告诉他们我已结婚生子，我的所见所闻，我的行动，我所关心的事情，以及我隶属左翼的政治立场。多年

后，学生跟我抱怨，说我这么做搞乱了他们的社会系统。因为当时的校园社会系统取决于你掌握多少受欢迎的教授的私人信息。而我公然谈论自己，每个人都知道我的私人信息。这就是我如何在课堂上做自己的一次有趣的斗争。

学生怎么评价你？

莎伦·安·霍尔特：有一个故事发生在乔治城大学，我在那里教了一年书。乔治城大学有“预备役军官训练团”项目，那些打算成为军官的年轻男女以本科生的身份参加这个项目。我从未研究过战争，所有知识来自美国史的教科书。因此，我在那个夏天全身心投入到课程准备之中，研究战役、战略战术、武器、将军的传记、战争的本质和过程。9月

地为“罗森堡太太”(Mrs. Rosenberg)而非“福斯特教授”(Professor Faust)。我提及这个故事，想问您如何看待自 20 世纪 60、70 年代以来女性地位的转变？

莎伦·安·霍尔特：更有趣的是，他们最初打算聘请她丈夫查尔斯·罗森堡(Charles Rosenberg)，他是著名的科学和医学史家。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他们知道要聘请罗森堡，就得为他同样是学者的太太做点事。他们给“查尔斯·罗森堡太太”写了封信。更糟糕的是，他们给她提供了“妇女研究”领域的工作。福斯特教授是一位历史学家，尽管后来撰写了一些重要的妇女史著作，但在当时并不是妇女史学者。只因她是女性，校方就想当然认为她只对妇女研究感

就会受到惩罚。1919 年，爱丽丝·保罗(Alice Paul)和她的追随者因为主张扩大妇女参政权，反对女性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而遭到逮捕，这在当时是正确的；因为我们要求同等的权利而监禁我们、强制喂食，这在当时也是正确的；在美国死亡的女性中，有七成命丧于她们朝夕相处的伴侣之手，当时人也觉得稀松平常。我们要处理、克服这样的观念。我们需要从精神和生理的屈辱中幸存下来，这种屈辱常常伴随我们，当我们为某个角色试镜、为论文答辩、应聘公司管理人员，经常会遭遇性别歧视。女性为着一个成为“完整的人”的目标而努力，在场的男性却因为性别对她们加以区别对待。

在 19 世纪 40 年代《已婚



在反映女性自我追问的影片《时时刻刻》中，妮可·基德曼饰演的“有独立写作房间”的女作家伍尔夫。

份，当我第一次踏入教室时，我很确定有五位预备役军官训练团的学生选了课，他们坐在最远端，看上去并不信任我的讲课。我开始谈论战争中士兵使用的滑膛枪和步枪造成创伤的差别，及其对内战时期医疗实践的意义。大概一刻钟就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我们合作了一学期，相处愉快。

我处在混合的多样性之中：我不是黑人，但我教授黑人史；我不是男人，但我开设的军事史往往由男性来教授；在传统观念中，我所教授的技术史也属于男性的领域。我对质疑习以为常，一再面对这些问题。总之，时常遭遇传统的性别问题，已成为我以学者身份成长的一部分，也颇有趣味。

20 世纪 80 年代，哈佛大学给您的硕士导师德鲁·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提供了一份教职，但他们在信中称呼

兴趣。哈佛聘请了她，最终她成为哈佛的校长，至此，他们终于知道了她的名字。

如今的女性群体斗争运动是这些年来女性运动的真正遗产。人们对它寄予厚望，认为它能带来巨变，对此我十分欣喜。我们是“完整的人”吗？“女人”和“完整的人”是否格格不入？如果我们是“人”，我们就像其他人一样拥有人的权利，有权利工作和爱，提起诉讼、拥有财产、赚取工资、得到安全、不受虐待。但是西方世界的历史一直以来都建立在一系列贬低女性的想象的基础之上。在缺少完整人性的社会中，我们以多种方式发挥作用。我们曾被当作财产和等价物；我们还做过再生产和赚钱的机器；我们是替罪羊。即便在像美国这样基于自由而建立的国家中，女性长期以来都未获得“完整的人”的待遇。社会敦促并鼓励我们接受这样的自我，要是我们拒绝，

妇女财产法》颁布前，妇女不能合法拥有自己的财产和收入，无法拥有不动产，也不能担任法定代理人。一切改变始于《已婚妇女财产法》废除了“丈夫保护妻子身份”的法律身份，无论婚否，女性都有独立的法律地位。接着我们经历教育变革，女性开始接受基础教育，后来还能上大学，我们开始从事专业工作，获得投票权，拥有政治影响力，竞选公职。这些都很重要。为了扩大我们身为“完整的人”的权利，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推动。

女性不断斗争，争取作为“完整的人”的资格。我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男性有责任对此表示尊重。可悲的是，在种族和性别问题上我们依旧任重道远。享有特权的白人女性为自己争取的权利，要远远多于非洲裔美国女性为自己争取到的权利。不能再次把姐妹们落下，这是我们的责任。